专栏





浦东盐业的败落有自然的原因,也有制度、战争等诸多因素。

如果从南宋建炎年间(1127年—1130年) 至清道光年间(1821-1850年)计算,下沙盐场 有着长达近700年的历史。这对仅有千年历 史的浦东不能不说产生了深刻影响,浦东经济 与社会的发展、人口与民俗的变化中无不留下 盐的烙印。正所谓,一部浦东史,半部制盐史。

一部浦东史半部制盐史

□谢国平

海水趋淡,盐业开始败落

自元代中叶起至明中叶止(14—16世纪初),是下沙盐场的鼎盛时期。《华亭县志》《上海县志》有这样的记载:元代,在上海地区的5个盐场中,下沙盐场的产量是最高的。《下沙镇志》统计显示,元至正年间和明正统年间,额定盐产量分别高达6680吨和8450吨。当然,上交税收也最高,"赋为两浙最"。据统计,其中下沙3个场中,二场最高。

明正统年间(1436—1449年),下沙盐 场进入了最后的辉煌。全场共有灶丁 1.57万余丁(附近丁9000余丁,远乡丁 6600余丁)。算下来,每灶户有灶丁100 多人。拥有草荡约3.1万顷,年产盐约4.5 万引,折算为1800万斤,达到最高记录。

辉煌之后是败落,原因有很多。浦东沿海的海水变淡是重要原因。据上海历史学家马学强考证:明以前,上海八团、九团护塘外皆聚灶煎盐,产量很高。至明隆庆、万历年间,已不产盐,"以海口淡水渐南,地不产盐。明季久已停煎。"上海沿海海水趋淡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既有自然条件变化,"东南地涨",也有海塘修筑、河道淤塞、沙堤壅隔等因素。海水变淡,给盐业生产带来了致命性的影响。如"下砂头场及二、三场久不产盐",早已是徒具盐场的名称而已了。

从地理上看,长江水系每年输出泥沙 4.4亿至4.6亿吨,在入海口不断沉积,形 成广阔的三角洲平原。浅海滩慢慢地向 东延伸,盐场离海日远,煮盐成本日增。 同时,由于淡水流入,上海近海海水的含 盐量逐渐稀薄,"熬波煮盐"也就不行了。

明末大儒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 书》中记录了这种变化:"沿海皆浅滩,物 产不逮闽浙百一,俗号穷海,独盐利为饶, 自清水湾以南,教川沙以北,水咸宜盐,故 旧置盐场。近有沙堤壅隔,其外水味浸 淡,卤薄难就,而煮盐之利亦微矣。"

对于这一现象,朝廷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以鼓励盐业生产。"优恤灶户者甚厚,给草场以供樵采,堪耕者许开垦,仍免其杂役。又给工本米,引一石。","甚至灶户杂犯死罪以上止予杖,计日煎盐以赎。"

又比如明嘉靖十九年(1540年),明政府再调整政策,将盐民分划出滨海和水乡两类生产任务不同的灶户。"灶户附近能煎熬盐者曰滨海,居远不能煎盐者曰水乡"。同时规定,滨海灶户依靠煎盐纳课、领取工本为生。水乡灶户则不再参与盐的生产,改行农副业生产,他们必须出钞给滨海灶户,代为煎盐纳课。也因为这种变通政策,开了弄虚作假之大门,有人从中牟利。"浙江海盐一带沿海居民专一兴贩私盐",私盐充斥市场。

后来,又改为水乡灶户直接将盐课折 为银两交纳给官府,滨海灶户也可以折银 代盐了。这个变化意味着,灶户们只要有 银子纳课,官府就不再管他们生产如何, 盐民们相对减轻了强制煎盐的劳苦和盐 官强暴的催逼,并开始转业,较自由地生 产其他农作物。

除了自然的原因还有人为的原因,那就是战争。明代,浦东地区盐业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。明代嘉靖年间,倭寇不断地侵犯骚扰沿海地区,对盐业生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明嘉靖三十二年(1553年),倭寇侵袭,下沙盐场二、三场的灶户大逃亡,仅剩一场还在产盐。明万历二十四年(1597年),盐课归荡征收,额定盐产量已降为2820吨左右。

盐业专卖导致疯狂掠 夺和腐败

浦东盐业在明代的衰落,还有一个大 的背景,即明代专制的高度恶化、腐化、流 氓化。秦建立的大一统皇权制度,到明代 达到了"一种深度的癫狂状态",这在盐业 中表现得极为显著。明初朱元璋严禁权 势之家染指盐业,国家严控食盐专官以保 证朝廷税收。但是永乐以后,从皇家贵族 到宦官,奸臣、大小贪官等无不将盐业视 为"肥肉",尽一切手段榨取之。到了宣 德、正统年间,禁令成了一纸空文。在成 化年间,那些皇亲国戚甚至直接奏请皇帝 取得巨额盐引,倒手转卖谋取暴利。到了 弘治年间,盐业专卖已为这些人所垄断。 按史学家王毅的说法:"对整个社会实施 超强度的政治钳制和几乎无限制的经济 掠夺;而依靠这种钳制和掠夺所榨取的超 常巨大的利益,反过来更强烈地刺激着专 制欲望的膨胀。"

明代小说《金瓶梅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:新科状元蔡一权回家探亲路过西门庆家,西门庆好酒好菜加美女予以招待,临别时还送上一百两银子。后来,蔡状元上任两淮盐运使,便让贩盐的西门庆比别的盐商早取一个月的盐引,竟然获利两万两银子!

所谓"盐引",是政府发给盐商的食盐运销许可凭证。就是说,取得盐引才能合法地进行食盐贩售。在那个年代,任何资源一旦实行了许可,腐败寻租现象就不可避免了。尤其是有着巨利的盐业,尤其是皇亲权贵集团插手其中,腐败必定是疯狂的。这一点在明代的盐业专营制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历史学家高春平认为:明代盐政之弊积重难返,利益集团的固化、腐败土壤的硬化、寻租行为的常态化格局很难打破。"看不见的手"和"看得见的手"梅弈的结局,使封建专制政治母体内的腐败毒瘤难以割除,盐业市场继续走向垄断,以魏忠贤为典型的宦官专权登峰造极,大明王朝行将灭亡。

退一步说,即使浦东盐场的自然环境没有变化,资源依旧,但在明代盐业专卖制度下,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:"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和接连管理失误而受到妨碍,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全部资源,尽管这些资源十分丰富,可以想象其有无限的发展潜力,但是专卖制度无力去开发这些资源。"

也就是说,其根本是一个制度的问

题!而因为这种制度又催生了既得利益集团,结果可想而知。

在这个大背景下,上海地区的盐场出现了盐民逃亡的现象。由于官府给盐民生产所需的工本钱越来越少,盐民也只好另觅生路。有的灶丁渐渐逃离盐场,走上商贾之途;有的灶丁进入城镇打工。到了明代末年,"挂壮丁,十无二、三见在,而见在者亦不至场。"

随着盐丁的不断离去,属于盐场的滩地,被当地豪强乘机夺占。他们招募外来贫民耕种樵采,晒盐纳课。那些滩地渐渐成为私人的良田,后来甚至连晒盐的灰场,也成了私人的财产,灶户制盐反倒向据有者租用。对此,地方官员不但不加以制止,反而发放地契,以得额外的地租收入。明代正德内阁首辅大臣梁储上奏书中叹道:"非唯有坏盐法,抑恐激成他变!"

单一的调味品不再支 撑浦东的经济

明末,浦东盐业已不可扭转地衰落了。清代初期,清政府因下沙盐场盐灶仅存200座左右,且都集中在一场,故裁下沙二场、三场。之后,随着下沙盐场量减,导致市面上盐的零售价格成倍上涨,惊动了朝廷。乾隆元年(1736年)8月,年轻的皇帝在一道谕旨中忧虑地写道:"松江一所,原属滨海产盐之区""向来盐价甚贱,居民称便。十余年来,盐价增长。近则加至二三倍不等……朕心深以为忧。"

可以想见,上海境内盐业生产对于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影响,但是"场盐少产"不可避免。到清道光年间(1821-1850年),下沙场全部停止烧盐。盐业的衰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浦东经济和社会发展。单一的调味品不再能支撑浦东的经济。而因盐兴旺的新场也繁荣不再,曾经的一团,即今天的大团镇曾经"盐房栉比",但因"海滨多积沙,距镇渐远,灶民归农者众,盐房仅存十之一、二了。"

从南宋建炎年间至清道光年间,下沙盐场有着近700年的历史,这对仅有千年历史的浦东不能不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浦东经济与社会的发展、人口与民俗的变化中无不留下盐的烙印,明白这一历史就不会对浦东地名中有那么多"团""灶"以为奇怪了。正所谓,一部浦东史,半部制盐史。

浦东的这段历史既让人兴奋又让人 唏嘘。因为靠海,有了盐,又因为有了 盐,而有了先民们在浦东大地上的生生 不息,创造了浦东的一段繁荣史。比如, 随着盐区东移,盐务办理机构由下沙移 到新场,之后再由新场移大团,就有了所 谓下沙"商贾咸集,遂成都会",新场"歌 楼酒肆,贾街繁荣,虽县亦未之过也",以 及后来的"金大团"等集镇的繁荣。但兴 盛于斯,也败落于斯,积累的财富并没有 转化成更大的生产力,繁荣的历史也被 终结。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。









